

第七章

缩小中国地区间差距的前景

Jane Golley

引 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30 年来，遍及中国各省份和地区之间（及各自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在不断扩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象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巨大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中国东部地区拥有许多历史和地域优势，使得这里的工业化要早于全国其他地区。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以及后来的沿海发展战略，以一系列优惠政策综合以上优势，明确地将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置于优先地位。然而，邓小平在谈到“两大形势”时坚持认为从长远来看“不会有贫富两极分化”，其他地区的人们只需要一点点耐心。沿海省份在改革初期会享有优势，但随后其利益将服从于内陆地区（邓小平，1987）。

1999 年底，江泽民宣布了西部大开发战略（WRDP），指出这一战略的实施是贯彻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形势”伟大战略思想、逐步消除地区差距、巩固民族团结、确保边境稳定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推出了无数的政策和项目，包括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保护西部脆弱的生态和环境、提高劳动力素质、推进企业改革和结构改革、鼓励东西部合作、加快特定工业行业和重点项目的发展（如西电东送工程和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时间框架已确定为 21 世纪中叶，届时的设想是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大大缩

小”。

2002 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这个“巨大的系统性运动”还不够，本届政府于 2004 年正式推出了“振兴东北”计划，这一计划预计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一起实施到 2020 年。此外，针对中部地区的“中部崛起”计划于 2005 年底正式宣布，虽然该计划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可确认的方案（Chung 等，2009）。至少在纸面上，中国共产党似乎正在郑重对待地区差距问题，除了东部最发达省份以外的所有省份都已身处在这样或那样的目标当中。

发展不平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事关道德问题，对一个一直以平等原则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政府尤其如此。看起来邓小平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中国人民接受让有些人先富起来，但如果那些幸运儿与该国其他地区的差距继续扩大，而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会动摇”（Wang 和 Hu，1999：201）。这反过来又使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一个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预测未来 20 年中国的地区发展格局将如何展现，它取决于多种市场力量的不确定性和政策选择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相反，本章首先给出了一个中国的地区形势的快照，这些情况代表和反映了工业发展的一些最新趋势。然后针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旨在刺激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的众多战略，我们将研究中国实现哪怕其中一个地区战略目标的可能性，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考虑其乐观和悲观的原因。尽管本章提供了一些迹象表明有些行业已经开始了由东向西的转移，但这里提出的证据平衡显示，在没有重大的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到 2030 年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充其量只会“轻微缩小”。

地区快照

目前，中国共有 4 个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有 5 个自治区，分别是广西（壮族）、内蒙古、宁夏（回族）、西藏和新疆（维吾尔族）。“省”一词一般用来代表所有这些省级行政单位。本分析中不包括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虽然针对中国的地区划分有许多种选择，但在这里我们的讨论重点是针对三个主要的大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

北、江西、湖南；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广西。内蒙古和广西是在 1999 年底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时被重新划入西部地区。下面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新的划分。另外，“沿海”一词相当于东部，“内地”则包括西部和中部。

表 7-1 给出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2007 年的一些关键指标。在这里列出的所有指标（和几乎任何可以选择的其他指标）上，东部都优于其他两个地区。从东部到中部然后到西部的排名次序也是固定不变的，西部的城市化程度最低、教育程度最低、人们最贫穷、寿命也最低。西部工业国有化程度最高、出口份额最小、外国直接投资（FDI）也最少——这三个指标表明西部是中国各地区中改革最落后的。

表 7-1 地区印象（2007 年）

指 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人口（百万）	474.8	461.5	363.0
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36.5	35.5	27.9
城镇人口比例（%）	55.0	43.3	37.0
6 岁以上人口中：			
小学学历或更低学历人口的比例（%）	35.8	36.7	49.0
高中学历或更高学历人口的比例（%）	23.0	20.3	15.6
预期寿命（2000 年时）	74.3	71.6	68.4
人均 GDP（元）	30131	15939	12229
工业产出中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占份额（%）：			
国营或国家控股企业（%）	20.3	44.6	53.0
私营企业（%）	23.7	23.7	19.5
港资、澳资、台资及外资企业（%）	41.1	14.5	10.0
各地区出口占全国总出口额的比例（%）	88.2	8.0	3.8
各地区占全国总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	77.2	14.5	6.1
各地区占全国总预算收入的比例（%）	59.6	23.1	17.3
各地区占全国总预算支出的比例（%）	44.2	30.1	25.7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及中国国家统计局（NBS），《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

当然，在各个地区内部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可以从表 7-2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得到证明。2007 年，最富裕的上海的人均 GDP 是最贫穷省份贵州的将近 10 倍，而最近才重新划归西部的内蒙古的人均 GDP

表 7-2 人均 GDP 水平和增长率

地 区	2007 年人均 GDP(元)	平均年增长率(按目前价格)			
		1994 ~ 2000 年	排名	2000 ~ 2007 年	排名
东 部					
北 京	58204	13. 9	7	14. 6	19
天 津	46122	14. 1	4	14. 4	22
河 北	19877	14. 3	3	14. 6	18
辽 宁	25729	10. 7	24	12. 6	24
上 海	66367	14. 7	2	9. 8	31
江 苏	33928	12. 6	13	16. 3	8
浙 江	37411	13. 9	6	15. 7	12
福 建	25908	13. 6	8	12. 2	28
山 东	27807	13. 5	10	16. 5	6
广 东	33151	12. 4	14	14. 5	20
海 南	14555	6. 1	30	11. 3	30
中 部					
山 西	16945	10. 5	25	18. 6	2
吉 林	19383	10. 8	23	16. 0	10
黑龙江	18478	11. 6	18	11. 6	29
安 徽	12045	11. 6	19	13. 8	23
江 西	12633	12. 6	12	14. 7	16
河 南	16012	14. 0	5	16. 7	5
湖 北	16206	13. 6	9	12. 3	27
湖 南	14492	13. 1	11	14. 4	21
西 部					
广 西	12555	7. 7	29	16. 5	7
内蒙古	25393	11. 8	16	23. 3	1
重 庆	14660	—	—	16. 1	9
四 川	12893	11. 3	20	15. 2	14
贵 州	6915	9. 4	28	14. 6	17
云 南	10540	10. 9	22	12. 4	26
西 藏	12109	14. 9	—	15. 0	15
陕 西	14607	11. 7	17	18. 1	3
甘 肃	10346	12. 2	15	15. 2	13
青 海	14257	9. 8	27	15. 9	11
宁 夏	14649	10. 3	26	17. 1	4
新 疆	16999	11. 2	21	12. 5	25
平 均	18934	12. 3		13. 4	

注：“—”代表零。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及国家统计局（NBS）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是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的两倍多。这只是地区和收入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的一个例证。值得注意的是，除西藏外，所有的西部省份在 1994 ~ 2007 年间（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前 30 年）的人均 GDP 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而在 2000 ~ 2007 年间它们的表现又高于平均水平（新疆和云南除外）。此外，这两个时间段内西部人均 GDP 总量分别增加了 11.3% 和 15%，在后一时间段的增幅大于其他两个地区。但平均来看，三个地区在这一期间的增长率几乎相等，西部并没有超越其他两个地区。很难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是由于地区政策变化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这种变化是否会转化为较长时间内增长速率的持久差异仍有待观察。

2007 年，西部地区的年人均 GDP 为 12229 元——只有东部的 30131 元的 40%。2000 ~ 2007 年间，这两个地区的人均 GDP 的平均增长率几乎相同（尽管在地区内部各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按当前价格计算大约都为 15%。为了在 2050 年前彻底消除东西部的收入差距，西部每年的增长都需大幅快于东部地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以 2007 年它们各自的收入水平为出发点，为了让东部和西部的人均收入在 2050 年相等，如果东部在此期间平均每年增长 10%，那么整个西部地区每年必须增长 12.33%。即使有了这样的平均增长率，到 2030 年西部的人均收入也仅相当于东部的 2/3。很明显，要想更迅速地缩小收入差距，地区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就需要更大。这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在未来 20 年快于东部地区，从而缩小地区间平均人均收入差距呢？

近期工业发展趋势

中国不同地区在工业发展方面的差距是自 1978 年以来不断扩大的地区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7 - 1 说明了东部地区在中国工业总产值（GVIO）方面的主导地位。从 1978 年占总数的 59.2% 开始，东部地区的份额就一直稳步上升，到 2005 达到峰值 72.4%，然后在 2007 年份额略有下降至 70.4%。由于东部地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36.4%，因此东部的人均工业产值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近几年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迅速改善是否反映了西部工业产值在更加迅速地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产值地区分布的变化？

在这个问题上，份额变化分析给出了一些启示。正如在较早的“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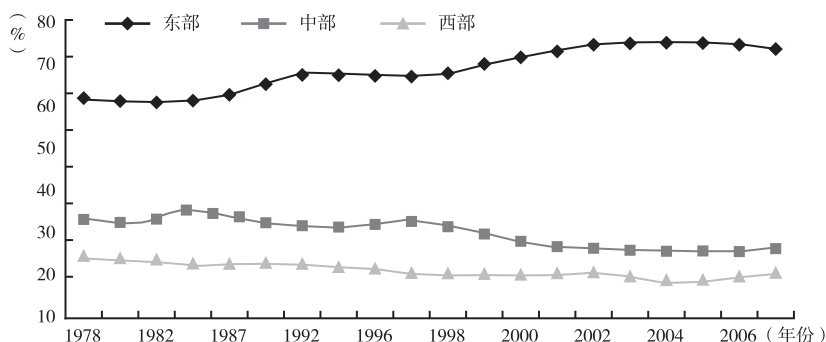


图 7-1 各地区的工业总产值 (GVIO) 份额

经济前沿”丛书 (Golley, 2003) 中所指出的, 份额变化分析将省级工业产值增长率分解为三个组成要素。其中, 用 ΔY_{ij} 来表示 j 地区的 i 行业从基期到末期的工业产值的变化。根据定义, 它等于 j 地区的 i 行业在基期的工业总产值 Y_{ij0} , 乘以 j 地区的 i 行业在整个时间段内的增长率 R_{ij} (见方程 7.1)。

$$\Delta Y_{ij} = Y_{ij0} \times R_{ij} \quad \text{方程 7.1}$$

R_k 和 R_{ik} 分别代表工业总产值的全国增长率和 i 行业的增长率。方程 7.1 可以分解为三个组成要素 (见方程 7.2)。

$$\Delta Y_{ij} = Y_{ij0}R_k + Y_{ij0}(R_{ik} - R_k) + Y_{ij0}(R_{ij} - R_{ik}) \quad \text{方程 7.2}$$

方程 7.2 右边的第一项叫做国家增长要素, 因为它是使 j 地区 i 行业的增长与国家趋势 (R_k) 完全匹配的部分。方程 7.2 右边的第二项是结构性的组成要素, 反映了 j 地区 i 行业的增长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地区的工业结合程度; 如果在一个地区的工业结构中, 主导产业的增长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R_{ik} 较高), 那么该地区的产出增长会快于全国其他地区。方程 7.2 右边的第三项是位置 (或剩余) 要素, 因为它衡量比较了 j 地区 i 行业的增长率与该行业的国家平均增长率, 从而反映了某一省的地方特色如何影响增长率。重新整理方程 7.2, 我们给出了 i 行业在 j 省的净相对变化 (NRC), 它是实际变化与和国家变化部分的差值 (见方程 7.3)。

$$NRC_{ij} = \Delta Y_{ij} - Y_{ij0}R_k = Y_{ij0}(R_{ik} - R_k) + Y_{ij0}(R_{ij} - R_{ik}) \quad \text{方程 7.3}$$

净相对变化 (NRC) 显示了 j 地区 i 行业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否快于或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值为正就表示快于全国平均工业产值的增长率。因

此， NRC 可以被视为相对业绩的一个指标，方程右边各项是对它的解释。还可以计算出每个省全行业的 NRC 值（见方程 7.4）。

$$NRC_j = \Delta Y_j - Y_j O R_k = Y_j O (R_k - R_k) + Y_j O (R_j - R_k) \qquad \text{方程 7.4}$$

在方程 7.4 中， NRC_j 是 j 省的 NRC 值，其他同理。如方程 7.4 所示，全行业的 NRC 完全取决于该省全行业的位置要素，因为结构组成要素变为了零。为进行 1994 ~ 2000 年及 2000 ~ 2007 年两个时间段的份额变化分析，我们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1995，2001，2008）中选取了 30 个省、36 个行业（如表 7 - 3 所列）的数据。其中，因为重庆在 1997 年才成为直辖市，因此本分析中将其纳入四川省，以使两个时期的数据有可比性。如此一来，一些有意思的点出现了。

表 7 - 3 列出了 2000 ~ 2007 年间每个省和地区的全行业 NRC 值和平均年增长率。这表明了份额变化分析中的第一个关键信息： NRC 值为正数表示该省的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为 22.3%），且 NRC 值就等于该省的增长率。东部和西部的增长率相同，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略低于平均水平。因此，似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西部工业产值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带动并提高了其经济增长率。那些地区总量显然没有表达出省一级的结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中部的 8 个省中有 5 个省的 NRC 值为正，而东部 11 个省中有 5 个省的 NRC 值为负。这些东部和中部省份在地理上的邻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尽管远不能称为证据），理论预测的产业转移可能已经开始（下文进一步讨论）。相比而言，西部省份的结果更不乐观，11 个省份中只有 3 个省的 NRC 值为正。

表 7 - 4 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它给出了 2000 ~ 2007 年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 36 个行业的 NRC 及位置组成要素。请注意，各地区中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工业产出增长率的行业（即结构要素为正的那些行业），其 NRC 可以记录为正，而每个行业的位置要素之和必须为零，因为它们反映了某一特定行业的区位优势。东部地区有 22 个行业的 NRC 为负值，表明该地区并非所有行业的表现都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在东部有 18 个位置要素为负值，表明东部并不在所有行业中都占有区位优势。中部和西部各有 18 个和 15 个行业的位置要素记录为正，也表明这两个地区至少在这些行业有一些优势。有 13 个行业中东部的行业产值比例超过 80%，有 32 个行业中东部的行业产值比例超过 50%（见表 7 - 5）。其他地区要想取得进展，则需要

表 7-3 全行业 *NRC* 值和工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 (2000 ~ 2007 年)

地 区	<i>NRC</i> (百万元)	平均年增长率(%)
东 部	2458.3	22.4
北 京	-2526.4	18.9
天 津	-2250.5	19.4
河 北	876.4	23.0
辽 宁	-1870.0	20.9
上 海	-7043.3	18.3
江 苏	3920.7	23.3
浙 江	4533.9	24.2
福 建	349.4	22.7
山 东	10426.9	25.6
广 东	-3999.8	21.2
海 南	41.1	22.9
中 部	-2968.0	21.7
山 西	2125.3	26.8
吉 林	-1324.8	19.6
黑龙江	-5255.8	13.4
安 徽	69.2	22.4
江 西	1783.3	27.1
河 南	3862.7	25.3
湖 北	-4950.8	16.3
湖 南	722.9	23.5
西 部	509.6	22.4
广 西	-121.2	21.9
内蒙古	2436.0	30.0
重 庆	889.1	23.1
四 川	-495.1	19.7
贵 州	-741.6	20.0
云 南	-38.5	11.9
西 藏	178.5	22.7
陕 西	-674.8	19.5
甘 肃	-106.9	20.5
青 海	-65.4	21.4
宁 夏	-750.2	19.3
全国总计	0.0	22.3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NBS），《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 2008。

表 7-4 地区 NRC 值和各行业的位置因素 (2000 ~ 2007 年)

行 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NRC	位置因素	NRC	位置因素	NRC	位置因素
煤矿采选业	425. 7	- 660. 0	1618. 6	94. 1	1089. 6	565. 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2866. 9	- 212. 7	- 3045. 2	- 614. 5	- 646. 5	827. 2
黑色金属采选业	812. 2	- 0. 6	264. 4	- 86. 4	264. 9	87. 0
有色金属采选业	- 40. 7	- 164. 4	305. 4	187. 8	98. 4	- 23. 4
非金属矿物采选业	- 263. 3	- 71. 8	10. 8	94. 8	- 84. 9	- 23. 0
食品加工业	- 446. 5	- 337. 7	89. 1	131. 9	181. 9	205. 8
食品制造业	- 1142. 2	- 601. 2	120. 7	281. 8	244. 8	319. 4
饮料制造业	- 2312. 8	- 407. 3	- 589. 0	125. 3	- 334. 2	282. 0
烟草业	- 566. 3	321. 8	- 857. 4	28. 1	- 1689. 2	- 349. 9
纺织业	- 3615. 1	896. 0	- 1527. 8	- 695. 8	- 567. 5	- 200. 1
服装制造业	- 3027. 1	- 19. 4	- 192. 3	28. 3	- 56. 2	- 8. 9
皮革、皮毛及下游产品	- 1199. 7	- 104. 1	- 91. 6	16. 7	52. 3	87. 4
木制品加工业	96. 7	- 201. 1	221. 7	144. 9	80. 4	56. 1
家具业	657. 5	120. 2	- 16. 8	- 108. 7	26. 7	- 11. 5
造纸业	- 728. 1	170. 6	- 213. 1	- 1. 3	- 282. 9	- 169. 2
打印和记录媒介制造业	- 504. 4	67. 9	- 128. 6	- 6. 4	- 177. 1	- 61. 5
文化、教育及运动用品业	- 829. 3	- 23. 2	- 3. 4	22. 4	- 1. 9	0. 8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2651. 8	- 533. 1	- 1479. 2	- 701. 0	956. 7	1234. 1
化学材料	762. 4	1096. 0	- 933. 8	- 835. 6	- 320. 4	- 260. 3
医疗和药品业	- 1222. 8	24. 6	- 448. 7	44. 0	- 422. 8	- 68. 6
化学纤维	- 1290. 7	198. 1	- 405. 4	- 169. 3	- 95. 7	- 28. 7
橡胶	- 215. 7	100. 9	- 78. 0	- 21. 4	- 109. 6	- 79. 5
塑料	- 747. 6	19. 0	- 83. 4	6. 8	- 70. 0	- 25. 8
非金属矿物制品	- 1208. 9	57. 1	- 284. 1	173. 8	- 477. 4	- 230. 9
黑色金属冶炼与轧制	8073. 5	857. 9	2184. 7	- 120. 7	978. 7	- 737. 3
有色金属冶炼与轧制	3456. 2	- 55. 0	2621. 6	534. 5	1604. 6	- 479. 5
金属制品	- 415. 2	109. 6	- 103. 1	- 46. 7	- 90. 6	- 62. 9
通用机械	3474. 3	367. 8	389. 2	- 130. 0	88. 1	- 237. 8
特种装备	- 261. 3	- 396. 5	117. 3	82. 2	327. 5	314. 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335. 0	1360. 8	- 939. 8	- 1423. 1	285. 4	62. 3
机电设备制造业	901. 0	- 1. 4	120. 6	9. 7	47. 3	- 8. 3
电信设备制造业	4950. 3	1907. 1	- 603. 1	- 750. 2	- 967. 5	- 1157. 0
仪器仪表制造业	228. 6	66. 1	11. 9	- 1. 4	- 53. 7	- 64. 6
电力、蒸气、热水供应业	2344. 2	- 332. 5	1212. 9	103. 5	1010. 6	229. 0
燃气生产与供应业	35. 3	- 93. 2	- 2. 8	- 33. 8	146. 3	127. 0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538. 1	27. 5	- 230. 3	- 33. 7	- 109. 0	6. 2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NBS），《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 2008。

表 7-5 工业产值的地区份额 (2007 年)

单位: %

行 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煤矿采选业	27.5	49.7	22.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37.9	29.7	32.4
黑色金属采选业	60.6	22.1	17.4
有色金属采选业	26.9	40.6	32.5
非金属矿物采选业	51.5	31.9	16.7
食品加工业	60.1	25.1	14.8
食品制造业	59.8	25.4	14.9
饮料制造业	50.9	24.5	24.6
烟草业	37.1	29.2	33.8
纺织业	83.8	10.9	5.4
服装制造业	91.6	7.1	1.3
皮革、皮毛及下游产品	86.4	9.1	4.5
木制品加工业	68.9	23.4	7.7
家具业	85.5	9.3	5.3
造纸业	76.1	17.3	6.6
打印和记录媒介制造业	73.9	14.8	11.4
文化、教育及运动用品业	95.5	4.2	0.4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63.8	20.6	15.7
化工原料及制品业	71.9	16.8	11.2
医疗和药品业	59.9	24.2	15.8
化学纤维	87.9	9.1	3.0
橡胶	81.4	13.4	5.2
塑料	85.3	10.1	4.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4.6	24.4	11.0
黑色金属冶炼与轧制	66.8	20.2	13.1
有色金属冶炼与轧制	45.4	30.1	24.5
金属制品业	87.1	8.9	4.0
通用机械制造业	80.6	12.4	7.0
特种装备制造业	70.0	19.9	10.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63.0	23.5	13.5
机电设备制造业	84.4	10.4	5.2
电信设备制造业	94.9	2.4	2.7
仪器仪表制造业	88.5	7.1	4.3
电力、蒸气、热水供应业	57.3	24.7	18.0
燃气生产与供应业	62.4	13.9	23.7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68.6	17.4	14.1
工业总产值	70.4	18.1	11.5

资料来源: 作者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 (NBS),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在那些东部没有正的 *NRC* 值的行业获得正的 *NRC* 值。对中部而言，2000 ~ 2007 年间有 5 个行业是这种情况：有色金属采选业、非金属矿物采选业、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和特种装备业。除了有色金属采选业，东部在这几个行业中的产值份额远远超过了中部，这表明任何形式的产值地区分布平衡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更遑论将这些行业集中在中部。对西部来说，也有 5 个行业符合要求：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皮革与皮毛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特种装备业。这几个行业中，西部的产值占比在 4.5% 到 15.7% 之间，但皮革与皮毛业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业都不是显著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反而在产业序列中属于资本密集型。我们把每个行业中的“人员工资”占总附加值的比例作为衡量行业劳动强度的指标，使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对 2005 年 44 个中国行业进行了计算。这些行业不完全对应于这里用到的 36 个工业行业，但是计算结果（从成衣制造业的 0.477 到原油和天然气行业的 0.091）至少显示出了各行业的劳动强度。那些对于中部和西部来说大有潜力的行业对国家工业产值的贡献并不大，没有一个行业进入行业前 10 名。

最后，表 7-6 对两个不同时期（1994 ~ 2000 年，2000 ~ 2007 年）的省一级结果进行了比较。该表并没有列出每个省和行业的详细数值结果，而是给出了每个省中 *NRC* 为正值（即是否主要靠结构因素和位置因素推动）的行业个数，以及位置因素有着积极贡献的行业个数。虽然由于各省表现的差异让我们很难对整个地区的情况作出概括，但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到，2000 年以后东部各省 *NRC* 为正值行业个数以及位置因素起积极贡献的行业个数普遍少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广东为例，*NRC* 为正值行业个数从 22 个下降到 12 个，而位置因素起积极贡献的行业个数从 29 降至 13。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孤例，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海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辽宁在这一趋势中显得格外突出，该省从位置因素中受益的行业个数从 1994 ~ 2000 年间的 3 个增至 2000 ~ 2007 年间的 22 个（注：辽宁省是东北三省之一，振兴东北计划从 2003 年起实施）。总而言之，该表的证据表明，东部地区的工业优势正在终结，这一点在与 Golley（2003）给出的结果对比中显得尤其明显。

中部地区的 8 个省中，有 5 个省的 *NRC* 为正值行业个数以及位置因素起积极作用的行业个数出现了增加，江西的情况最明显（个数分别从 5 增至 25，从 4 增至 27）。而且这 5 个省份在行业层面的 *NRC* 值也是正的。西部地区的结果好坏参半。奇怪的是，西部各省中增长率高于平均值的行业个数增加最多的两个省是广西和内蒙古，这两个省在 2000 年初刚刚被重新划

表 7-6 各省工业增长的份额变化分析

地 区	NRC 为正		位置因素为正	
	1994 ~ 2000 年	2000 ~ 2007 年	1994 ~ 2000 年	2000 ~ 2007 年
东 部				
北 京	12	7	11	8
天 津	18	6	22	8
河 北	18	10	20	9
辽 宁	8	16	3	22
上 海	19	5	14	5
江 苏	16	15	16	19
浙 江	24	22	27	26
福 建	21	21	22	22
山 东	16	26	15	27
广 东	22	12	29	13
海 南	18	8	18	6
中 部				
山 西	6	13	7	13
吉 林	11	11	9	13
黑龙江	11	4	5	5
安 徽	9	15	5	12
江 西	5	25	4	27
河 南	18	25	22	30
湖 北	18	2	17	2
湖 南	11	21	7	21
西 部				
广 西	6	13	2	15
内 蒙 古	9	21	6	26
四 川	11	21	8	27
贵 州	13	10	13	10
云 南	11	11	9	11
西 藏	12	2	12	4
陕 西	9	12	8	14
甘 肃	13	7	12	9
青 海	10	14	11	17
宁 夏	15	12	16	15
新 疆	13	13	13	13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和国家统计局（NBS），《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8。

分到西部地区，但广西并没有在行业层面确保 *NRC* 为正。四川（包括重庆）的情况似乎也在改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青海和陕西，但程度较小；而西藏、甘肃、贵州、宁夏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在变差。根据这些结果，目前很难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为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动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也是如此。

乐观的原因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国各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将在未来 20 年里逐步缩小。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在支撑东部的工业产值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降低了资本在该地区的边际生产力，导致企业家将投资转向中国其他一些投资相对回报率较高的地区。以不同的机制为基础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也有类似的预测：企业最终将搬迁到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只要地区间的运输成本长期低于某一临界水平，而且地区间存在一些劳动力无法流动）（Krugman, 1991；Puga 和 Venables, 1996）。这些模型的基础是来自 Hirschman（1958）和 Myrdal（1957）的传统观点，他们分别描述了大多数工业化中心的经济最终如何衰落或扩散到欠发达的周边地区。由 Akamatsu（1962）提出的“雁行”同样描述了国家（或地区）间产业转移的过程，该模型后来被用于形容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日本（头雁）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后来再转移到东盟（ASEAN）经济体和中国沿海地区（从雁）的过程。大量的跨区域多样性的存在使各地区产生了各自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为地区间产业转移提供了动力，从长远来看，最终将使所有的“雁”实现工业化！最后，Lewis 模型应用于地区范围内也可以预测地区之间收入的长期平衡过程。特别是，考虑到一个地区（沿海地区）是现代“资本主义”或各工业行业的故乡，而这些行业完美（或大量）地吸引着来自其他地区（内地）的集中在维持生存的行业中的弹性劳动力。一旦这种剩余劳动力耗尽（或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障碍导致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该模型预测整个经济体中的劳动力工资和人均收入都将上升（Lewis, 1952）。从本质上讲，所有这些理论都认为各地区的收入最终将实现平衡。邓小平在采用开放政策并要求内陆省份有一点耐心时，似乎对这些理论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很熟悉。

蔡昉和王德文（2006）及蔡昉等人（2009）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在中

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即使现在没有到达顶峰也快了。在 2006 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他们指出，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和由此造成的东部省份农村工资迅速上升的现象表明中国结束了其剩余劳动力无限的时期。这表明，企业可能（但并不保证）将开始在中国境内（即中部和西部地区）寻找其他生产地点。在 2009 年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蔡昉等人更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想法，他们断言中国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维持劳动密集型产业，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将导致产业升级并向内地搬迁。他们还采集了 2000~2007 年中国 31 万家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数据，并据此认为中西部相对于东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将使中国境内出现“雁行”模式。

蔡昉等人（2009）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将西迁，与此呼应的观点是，中国已经到达了其“刘易斯转折点”，其标志是曾在东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已经结束。Garnaut 和 Huang 研究了中国各地区和行业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需情况后，得出结论：

后劲十足的沿海地区将出人意料地很快从劳力密集型经济活动中转变，并会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再次建立优势。而乡村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以及城镇工资成本上升将有助于遏制收入的两极分化，缓解日益紧张的社会矛盾及人们的担忧。（Garnaut 和 Huang，2006：32）

假如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劳动力也可以跨省流动的话，沿海地区工资的增加将同样提高其他地区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而赴东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因此也有助于改善地区收入分配状况。最近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见本卷 Garnaut，蔡昉和王美艳的章节），再结合蔡昉等人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成本优势正在增大的描述，中国区域发展的未来看起来十分光明。

地区政策有可能对实现这一成果作出积极的贡献。正如 Lai（2002）指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引入不仅是要减少地区发展差距，平息不满情绪，也是为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必要的国有企业（SOE）改革给予支持，并鼓励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努力取得了成功，结合西部地区及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改善，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该地区进行生产。振兴东北战略如果成功地促进了迫切需要企业改革的话，同样可以让东北地区越来越有吸引力，而中部省份自然可以因邻近东部而受益，因为前面指出的份额变化分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

实行能够确保剩余劳动力可以迁移到最有生产力的地区的政策，以及大力提高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也十分重要。当然，让这些地区同时工业化且均衡地迅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但是，其中任意一个地区的成功都将对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另一个乐观的原因是工业发展显然不是地区发展唯一重要的因素。西部地区在中国的矿产和能源资源中占有很大份额，这些资源对于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工业行业至关重要。如果西部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即使其平均工业产值低于平均水平，它也可能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均收入（就如现在的西澳大利亚一样）。

悲观的原因

对于以上所有认为从长远来说收入将趋同的理论，都有与之相反的理论存在着；对于每一个能够证明实现收入趋同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证据，都有与之矛盾的证据存在着。

有大量的文献在讨论中国快速增长的根源，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一增长的类型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前者表明增长主要靠快速的劳动力和资本积累推动，后者表明增长的基础是由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的增长。早期有学者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例如 Jefferson 等人（1996）、Borensztein 和 Ostry（1996），也有一些学者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投资是主导因素，如 Wu（2003）、Chow 和 Lin（2002）。假如这种增长是由资本投资所推动，则标准增长理论认为在地区间将会出现条件收敛，因为投资者最终将在资本存量低的地方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然而 Chi（2008）指出，鉴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化，并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为什么可能会在可见的将来进一步恶化给出了明确的理论原因和实证原因。他特别指出，当技术变革是技能偏好型而不是如标准增长理论所假设的中立型时，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省份将继续吸引到较高水平的物质资本投资。这种技能—资本的互补性意味着，资本仍会继续流向东部地区，这与新古典主义的预测结果恰恰相反。Chi 的证据表明，大专层次的教育是这个技能—资本联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此外，中西部地区省级政府增加教育支出对于增加对这些省的大专层次人力资本存量作用不大（虽然对于减少小学层次比例、提高中学层次比例有一些影响）。根本结论就是，除非内陆省份能够极大提高其人

力资本存量，否则资本流动将继续支持东部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地区间差距仍将扩大。

而一旦中国的增长改由生产率提高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地区间差异会给地区间收入的平衡带来一些希望。Cai 等人（2009）计算得到 2000 ~ 2007 年全要素生产率占工业产值增长的 18% ~ 28%，而且发现在东北、中部和西部有更高的份额。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高纪录在中部地区，这为中部奋起直追燃起了希望，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非常相近。西部在生产率方面似乎并没有大大地落后于东部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令人鼓舞的。但这样的结果让人感觉追上东部的希望不大，除非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得更高。

Krugman（1991）对于市场经济中工业发展空间格局的描述指出，产业先集聚再分散的过程很可能最先发生在对成本最敏感、劳动最密集、对位置最没有要求的行业，这些行业不依赖于特定产地的原料，因为当工业核心区工资不断上涨，地区间交通联系不断改善时，迁移对这些行业来说首次成为有利可图的举动。如果针对 2000 ~ 2007 年的份额变化分析表明，正是这一类型的行业开始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大放光彩（尤其是那些在工业产值份额方面排名靠前的行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该行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9.8%，并且是劳动最密集的行业之一），那么我们会有一些乐观的理由了，因为中国已经开始这一进程了。相反，正如上面所讨论，在中西部地区表现良好的行业一般都不是那种可以到处迁移的行业（如采矿和选矿行业）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反过来，这可能涉及中央政府针对某些在西部地区“优先”发展行业而明确提出的优惠政策，这可能违反了市场规律，并且从长远来看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里不再进行深入讨论。详细讨论见 Golley（2007：第 8 章）。

根据上面提到的理论，关于从长远看来产业转移是地区间收入平衡的关键，另一个悲观的原因是理论和现实大多数时候并不相符。要中国的工业产值永远平均分布在其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土面积上既不可能，也确实不适当。仅举几个例子，实际上，根据对美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观察，部分地区会一直相对贫穷，人们总是从那里迁向该国的甚至世界上其他比较发达的地区。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已经耗尽了它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资源。Meng 和 Bai（2007）研究了 2000 ~ 2004 年间广东省 7 个工厂中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结论是这一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为负或者为零，“在工资增长如此小的情况下，很难说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第 172 页）。同样，虽然

Athukorala 等人 (2009) 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省份 (广东、上海和广西)，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劳务输出的内地省份 (四川、甘肃和青海)，他们仍然认为“即使是在分散层面对官方数据进行分析，也表明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有着明显连续的双重性与过剩的劳动力条件” (第 199 页)。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除了 1 亿多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人口 (主要的方向是从西部涌向东部)，产业改革还从国有行业释放出超过 4000 万工人等待进入迅速发展的非国有行业。工作适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 (预计将持续到 2015 年) 和劳动参与率的增加是导致城市劳动力供应量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Golley 和 Tyers, 2006)，另外还有数千万未充分就业的农业人口和保守估计全国约 710 万已登记在案的失业城镇职工 (国家统计局, 2008)。关于何时会到达转折点尚需进一步的讨论，在到达那一点之前地区不平衡不会开始减小。

现阶段在政策方面，可能悲观的理由要多于乐观的理由。Naughton (2004) 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WRDP) 的许多项目 (最明显的例子是横跨国土的能源项目) 基本上都属于国家层面的，没有地区目标，不太可能明显改善收入的不均衡。他还注意到，在中央指导的地区战略中所固有的缺乏激励机制的问题，使得省一级和更低级别的领导人以贫穷为由争夺有限的 WRDP 资金。此外，西部和东北省份领导人的想法被认为过于保守，过于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再加上证据确凿的腐败和滥用分配的资金，这些都成为推行地区战略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Lai, 2002; Chung 等, 2009)。Golley (2007) 将西部大开发战略描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政策，其中，中央政府似乎是通过国家所有权和法令来控制发展，而不是采取政策来成功地刺激当地自我可持续的增长。作为这项政策的一个例子，在 2003 年发表的一份政府白皮书中指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被“分配”到新疆。如果这是国务委员说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将被孔雀向西飞现象所取代” (Goodman, 2004: 327)，它已经和市场没有多大的关系，完全是国家所为。它也否认了 Naughton (2004) 提出的在中国西部地区最有可能减少贫困并因而减少不平等现象的单一因素：向外迁移。外迁不仅为移民提供了机会，也缓解了某些地区的经济和生态压力。然而，人口大量外迁也带来了人才流失的威胁，使得长久以来落后地区发展工业更加艰难。此外，移民源源不断涌向东部有助于维持那里较低的工资，拖延工业企业搬迁到其他成本更低地方的决定。把这些与上面提到的目前工业发展的趋势以及西部地区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众多劣势 (中部地区情况稍好) 结合起来，就是中央政府之所以要在未来 20 年内尽力实现地区政策目标的一系列理由了。

结 论

30 多年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存在巨大且仍在加剧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本章考察在欠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较快的工业发展速度是否有可能在未来 20 年内成为减少这些不平衡的关键因素之一。

乐观的回应是，是的，它是有可能的。2000 ~ 2007 年间的份额变化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工业占优势的辉煌岁月即将结束，该地区在许多行业的表现不及平均水平。除了这一证据，还有学者声称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状况也即将结束，东部地区不断上升的成本将推动当地的产业升级，也激励企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搬迁。制定一个认真而坚定的向西部倾斜（或至少不向东部倾斜）的地区战略，再加上数额巨大的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资助，对于激发东部外围地区的自维持的工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东部地区收入的提高将增加对非本地商品的需求，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有可能将扮演东部经济起飞时西方工业化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所有这些优势都转换成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的话，该增长率维持在 2% 甚至更高的机会非常小，即实现“大规模减小”地区差距的战略目标希望不大。但这并不是说地区差距不会减小，尤其是当把其他非工业因素考虑进来之后，例如人口外迁和资源收入会提高西部地区剩余人口的人均收入。

悲观的反应是否定的，即它是不可能的。即使东部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当地的产业升级，但产业转移的方向可能并不是向中国内地其他地方转移，而是向其他竞争对手国家转移，如印度和越南。那时中国西部只能用贫穷和不发达来形容，当然该地区可能会有少数几个工业化城市。缺乏国内的整合使东部地区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西部地区则越来越排除在世界和东部地区之外。

试图通过回顾过去来对未来进行精确的预测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很显然，未来 20 年内中国地区工业发展的真实路径将介于上面这两个极端之间。根据本文给出的证据，结合我过去十多年在这个课题上的研究，表明未来 20 年将会见证由有限的产业再分配部分支撑的有限的地区人均收入分布的改善，产业转移的方向是部分的中国的内陆各省。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某种形式的地区差距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困扰着中国的决策者们。

（樊腾飞 译）

参考文献

1. Akamatsu, K. 1962,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no. 1, pp. 3 – 25.
2. Athukorala, P. – c., Fukao, K. and Yuan, T. 2009,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 in R. Garnaut, L. Song and W. T. Woo (eds),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ANU EPress, Canberra.
3. Borensztein, E. and Ostry, J. D. 1996,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perform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2, pp. 224 – 8.
4. Cai, F. and Wang, D. 2006, 'Employment growth, labour scarcity and the nature of China's trade expansion',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5. Cai, F., Wang, D. and Yue, Q. 2009, 'Flying geese within borders: how does China sustain its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R. Garnaut, L. Song and W. T. Woo (eds),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6. Chi, W. 2008,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and new evidence',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9, pp. 421 – 36.
7. Chow, G. and Lin, A. – I. 2002, '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0, pp. 507 – 30.
8. Chung, J. H., Lai, H. and Joo, J. – H. 2009, 'Assessing the "Revive the Northeast" (zhenxing dongbei) programme: origins,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7 (March), pp. 108 – 25.
9. Deng, X. 1987, *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 Day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10. Garnaut, R. and Huang, Y. 2006, 'Continued rapid growth and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development',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11. Golley, J. 2003,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China 2003: New engine for growth*,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12. Golley, J. 2007,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Regional Development: Market nature, state nurture*,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
13. Golley, J. and Tyers, R. 2006, 'China's growth to 2030: demographic change and the labour supply constraint',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14. Goodman, D. S. G. 2004, 'Qinghai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st: nationalities, communal interac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s New Series, no. 5, pp. 379 – 99.
15. Hirschman, A.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onn.

16. Jefferson, G. , Rawski, T. and Zheng, Y. 1996, ‘ 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rend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3, pp. 146 – 80.
17. Krugman, P. 1991, *Geography and Trad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and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8. Lai, H. H. 2002,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 its rationale, implementation and prospects’, *Modern China*, vol. 28, no. 4, pp. 432 – 66.
19. Lewis, W. A. 1952,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 22, no. 2, pp. 139 – 91.
20. Meng, X. and Bai, N. 2007, ‘How much have the wages of unskilled workers in China increased? Data from seven factories in Guangdong’,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21. Myrdal, G.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Gerald Duckworth, Essex, UK.
22.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1995,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5*,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23.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2001,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24.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2008,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25.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various year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 Statistics Press, Beijing.
26. Naughton, B. 2004,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program’, in B. Naughton and D. Yang (eds), *Holding China Together: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Deng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7. Puga, D. and Venables, A. 1996, *The spread of industry: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54,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28. Wang, S. and Hu, A. 199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M. E. Sharp, Armonke, NY.
29. Wu, Y. 2003, ‘Has productivity contributed to China’s growth?’,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1, pp. 15 – 30.